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

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

蔡宗齐 著 陈婧 译

Han Wei Jin Wuyan Shi De Yanbi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

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书

蔡宗齐 著 陈婧 译



卷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24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蔡宗齐著;陈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5785-2

I. ①汉… II. ①蔡… ②陈… III. ①五言诗—诗歌研究—中国—汉代~晋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8739号

The Matrix of Lyric Transformation: Poetic Mode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Early Chinese Pentasyllabic Poetry

By Zong-qi Cai

ISBN:0892641118

First Edition © 1996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

著作责任者 蔡宗齐 著 陈 婧 译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785-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6印张 200千字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很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

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趋式微,甚至被人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

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于1997年由密歇根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出版。出版之后,我立即开始撰写 *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Thre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比较诗学结构: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刘青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完成后又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直至2005年我编纂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 时才又回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时隔十余年,我研究古代诗歌的内容和方法有了较大的改变,所以第一部书就更显得是陈年旧作了。要不是陈婧同学热忱地帮助把全书译成中文,给了我校对译稿的任务,恐怕我是不会想到再碰此书的。没想到的是,在校稿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反思起当年求学的心路历程,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由于这些个人感想多涉及做学问的理念和方法,讲出来也许对读者有所启发,所以不顾敝帚自珍之嫌,把它们整理出来,写成这篇序言。

我于1987年从麻省大学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在恩师高友工教授门下修中国古代诗歌,至1997年博士论文改写好出版,正好是十年。此间,我在导师的指引下一步步地走进了汉学研究的殿堂,形成了自己学问追求的核心理念,逐渐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

做学问,著书立说,必须要阐发自己的独特见解。没有任何创新之处,最好不要写文章写书,以免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这样的观点可能

过于偏激,但它是我从导师的教诲中领悟出来的最重要的学术理念。凡是读过高友工教授《唐诗的魅力》《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等著作的人,不管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他的观点,无不觉得耳目一新,敬佩他崭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我有幸成为他的门生,受耳提面命,学术创新的理念自然就深深地印记在心中,成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

把学术创新的愿望变成现实的成果是极为艰辛的过程。我意识到,首先必须大量细读原文,选定研究领域中意义重大,同时自己又能驾驭的课题,接着要寻找研究该课题的最佳切入点,摸索出各种有效的分析策略和方法,然后再运用这些方法论证解答课题的方方面面。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总体构思、章节布局以及撰写都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

我攻读博士的专业是中国古代诗歌,重点在汉魏至六朝时期。在这几百年间,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成为统治整个文坛的最重要文体。因而我就决定寻找有关五言诗的论文题目。从刘勰、钟嵘开始,五言诗的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还有什么重要的课题等待我们去发掘探索呢?带着这个问题,我通读了重要的五言诗作,并且检阅了大量中文、日文、西文有关的论文专著,终于找到了自己觉得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汉魏晋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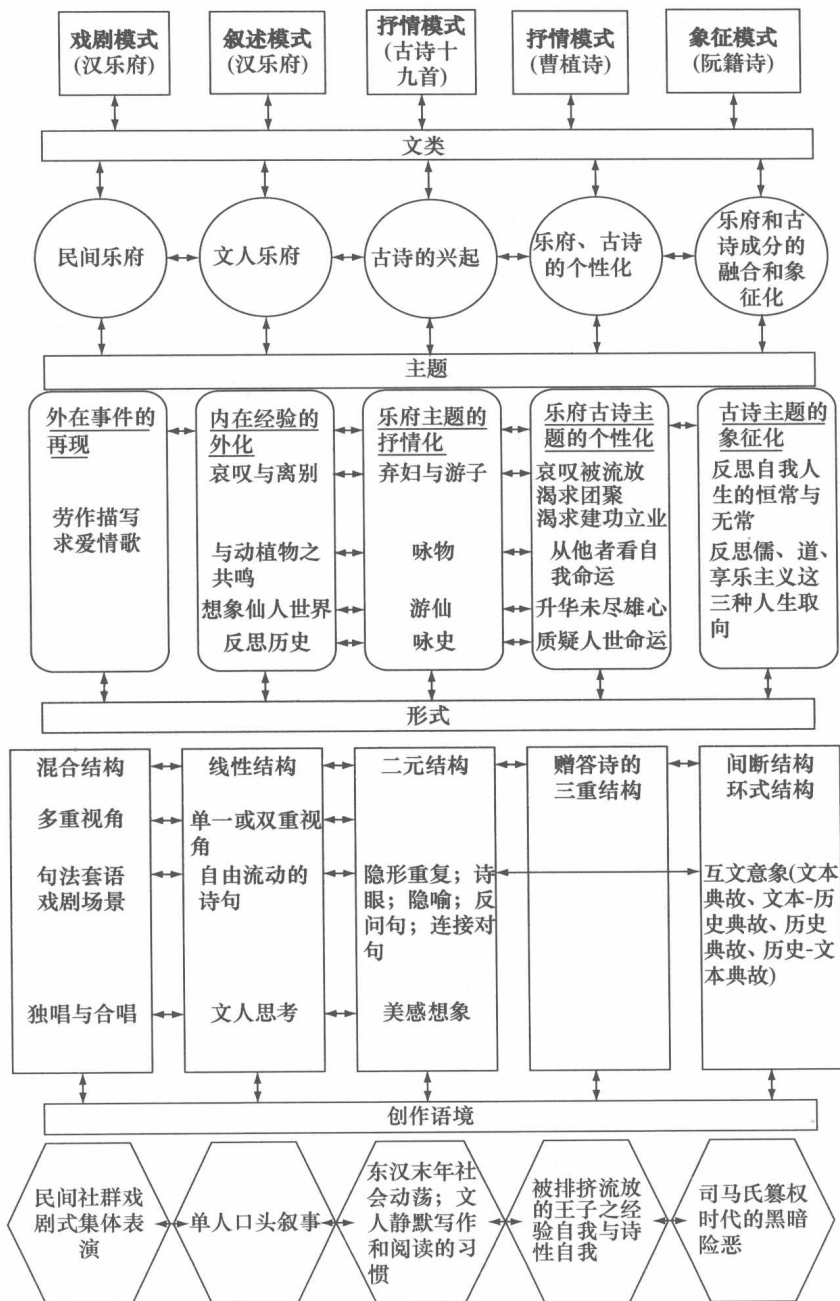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必须要宏观和微观兼顾、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tudies)相结合才能完成的课题。谈“演变”,无疑是历时的研究,必定要在宏观的视野中审阅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作者和诗集,勾勒出五言诗发展的轨迹。论“内在机制”,自然要探究每一组诗歌作品的文类、主题、形式的特征,以及三者的内在关系。对演变过程所作宏观的、历时的研究可称为“纲”,而对文本微观的、共时性的研究可称为“目”。研究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就是试图把“纲”和“目”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纲举目张。这种纲目结合的研究框

架,显然是没有任何现成的范例可参照的。

纲目分离,似乎是古今学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共同特点。古代论诗歌的著作不外两大类。第一类是宏观的诗史溯源,其中有的集中讨论某一种诗体的历史发展,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明诗》《乐府》《诠赋》诸篇和钟嵘《诗品》等;有的以生卒时间为序,列举历代重要诗人的成就,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刘熙载《艺概·诗概》等。这类著作中对大部分诗人或诗集的评论通常只是三言两语的概括,难以称为微观研究。第二类是微观的诗篇诗句评述,先散见于唐代以诗格、诗式、诗法等命名的诗歌写作指南之中,宋代以后则多集中收入没有明显时序或理论框架的各类诗话、词话之中,或夹杂在各种诗选的评点之中。这两大类论诗著作林林总总,但没有一部能真正做到纲目结合、相得益彰。

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诗歌的宏观和微观研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微观方面,论诗内容从诗篇诗句的评点扩展到诗人作品的整体研究,评诗方法则从印象式评点转变为各式各样受到西方批评流派影响的作品分析。诗人和诗集的研究专著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在宏观方面,诗体谱系的简述演变为鸿篇巨制的通史、断代史、诗体或流派专论,应有尽有,构成一个庞大的宏观研究系统。与古人所撰写的诗体谱系不同,这些宏观论著通常含有数量不少的作品分析。显然,现代的学者是在积极努力地把宏观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但这一努力并非十分成功。现有的文学史和诗史体例普遍是先将历史按朝代切分成若干大段,然后从大段中按文类分出中段,最后再顺着作者和作品的时序分出小段。在这种机械死板的框架之中,具体作品的细读自然会局限于就诗论诗,难以连成一个密切相联的有机整体,在不同层次上展现诗体历史演变的动态。

为了实现诗谱之纲和作品细读之目的结合,我努力尝试打通“目”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为了清晰明了起见,现用下图加以说明。



图中纵向箭头所指的是“目”之间的共时性关系,即作品文类、主题、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三大“总目”之下又有若干类“细目”。文类总目之下,五言诗有乐府和古诗两大类,而乐府之下又有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之分,主题总目之下有劳作、爱情、游子、弃妇、游仙、赠答、咏史、咏怀等细类。形式总目之下则有全篇结构、章节纹理、母题、套语、典故、意象等细类。在细读汉乐府、汉古诗、曹植、阮籍四组作品过程中,我着重研究三大“总目”之间的互动关系,寻绎出汉魏晋五言诗演变之“纲”,并分别用戏剧、叙事、抒情、象征四种基本模式加以理论概括。

图中横向箭头所指的是“目”之间历时的关系,即四大组作品在文类、主题、形式的演变。书中的作品细读很多涉及与先前或以后相似作品的比较,以突出展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独特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细读可以清楚地揭示四组作品在文类、主题、形式三大“总目”乃至其下繁多“细目”之间密切的承继关系。如果说本书首章介绍了古人所勾勒、本书所印证的汉魏晋五言诗演变之“大纲”,后面四章则展开比较细读,把此“纲”落实到微观的“细目”之上。末章则对全书的微观和宏观研究作出总结。

除了文类、主题、形式三大总目,图表还有创作语境一栏。四组作品所产生的语境也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内容。第二章运用文学和非文学材料,重构了汉乐府中戏剧式集体表演和单人口头叙事的场景;第三章转向探究《古诗十九首》静默书写的创作过程;第四章讨论曹植的人生经验与诗性自我之间的张力;第五章分析阮籍对儒、道和享乐主义三种人生哲学的矛盾态度以及其惶惶不可终日的心境。在讨论这些不同的创作语境时,我仔细探究它们如何影响制约诗人自我呈现的空间,考虑诗人们如何充分利用此有限的空间,不断改造现有的文类、主题、形式,从而创造出新颖独特的诗歌模式。

打通书中所有“细目”之间共时与历时性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努力。这两种关系如能真正打通,那么汉魏晋五言诗演变的内在机制也就跃然纸上了。本书这种求“通”的研究大大得益于传统文论中通变论与西方现代文论的结合。前者为全书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而后者则帮助改进了这一理论框架,使之更加丰富充实、用之有效。例如,对照结构主义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我看到传统通变论只谈宏观谱系,忽略具体文本分析的偏颇,故把文本细读作为本书的重点,视之为建立宏观谱系的基础。同样,借助西方古典文论中的“模式”(modes)概念,我观察到了各组作品“细目”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用戏剧、叙事、抒情、象征模式加以总结。其他的西方文论,如有关口头表演和书写文化的理论、读者接受理论、象征主义理论等等,则有助于开辟各种具体“细目”研究的新途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名言在思想史领域饱受诟病,但似乎可借用来总结此书处理中西文论的原则。如果一部学术著作的基本理论框架可称为“体”,其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可称为“用”,那么我就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之“体”应该是源于中学的,而其用则是中西皆可,两者酌情兼用为最佳。西方文学批评中常用的理论框架不宜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古典文学,因为它们植根于截然不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是为探索西方文学自身特有的课题而产生的。把西方理论框架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体”,中国古典文学自身势必沦为诠释此“体”的材料,恐怕连“用”也称不上。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此书撰写过程中,我不断寻找摸索一种既适合海外汉学研究语境,又可以实际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我的心目中,这种方法应该以中学传统为“体”,以西方文论为“用”,应该兼顾微观和宏观研究,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述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完成后,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摸

索,尝试从内文化、跨文化、超文化三个不同视角展开中西文论的微观和宏观研究,写了《比较诗学结构》一书。之后,我又努力将相似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典诗歌史和文论史研究之中。

这里,我不揣浅陋,向读者如实汇报了摸索研究方法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于广大读者对拙著的审评,也更希望能引起对古典诗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讨论。序中观点难免有偏激之处,敬请读者原谅。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广州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此书能收入吴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之中,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徐丹丽女士不吝赐教,匡正舛错,本人亦感激不已。书中尚存的谬误皆由本人负责。

是为序。

蔡宗齐

2013年4月

于伊州香檳城西梦文庐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汉魏晋五言诗概述	(7)
一、韵律规则	(7)
二、主要发展阶段	(10)
三、主题、形式、文类转变	(14)
四、诗歌的表现模式	(17)
第二章 汉乐府:戏剧模式和叙述模式	(22)
一、文类的区别:乐府与古诗	(22)
二、次文类的区别: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	(25)
三、民间乐府:集体创作和表演	(31)
四、文人乐府:缺少互动的叙事	(57)
第三章 汉古诗:抒情模式的兴起	(69)
一、主题重点:哀叹人世短暂	(70)
二、抒情过程:自我反思	(84)
三、诗歌结构:从线性结构到二元结构	(88)
四、诗歌纹理:静默写作和阅读之轨迹	(93)
五、美感活动:时间和空间想象	(103)

第四章 曹植诗:抒情模式的发展	(107)
一、诗人生平:经验自我和诗性自我	(110)
二、早期古诗:对友人的道德勉励	(118)
三、早期乐府:理想的自我形象	(125)
四、后期古诗:流放者的哀叹	(134)
五、后期乐府:流放者的自我投影	(146)
第五章 阮籍诗:象征模式的形成	(163)
一、诗人人生:矛盾行为和折中思想	(166)
二、诗歌意象:人生无常的四种象征体	(172)
三、诗歌结构:两种主要创新	(184)
四、互文关系:四种出典	(196)
五、三种人生哲学:恒常与无常	(207)
第六章 总结:四种诗歌模式和自我表现样式的转变	(211)
参考书目	(219)
译后记	(238)

前 言

本书的目标是系统考察五言诗在汉乐府、汉古诗、曹植(192—232)和阮籍(210—263)作品中的发展。中心主题有二:一是阐明这四组五言作品中主题、形式、文体的转变,并将这些转变置于四种重要诗歌模式(poetic modes)的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二是探索诗歌演变的内在机制,展示诗人们如何改变现存的诗歌模式,不断拓宽和深化自我呈现,同时又揭示诗人自我呈现的努力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背景、读者、诗歌传统诸外在因素的影响。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关于五言诗的研究,可追溯到刘勰(465?—520?)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约468—518)的《诗品》。刘勰《明诗》《乐府》诸篇讨论汉以后的诗歌演变,基本忽略了四言诗,而将五言诗作为研究主题。钟嵘则比刘勰更进一步提高了五言诗的地位。《诗品》称“嵘之所录,止乎五言”,将所有其他诗体均排除在外。后继朝代中,批评家们继续将五言诗当作最重要的诗体来讨论,且编纂了大量五言诗总集。萧统(501—531)《文选》辑入大量五言诗,数量上超过了全书十二卷中所有其他诗体。^①徐陵的《玉台新咏》则基本上是一部五言诗集。^②沈德潜(1673—1769)《古诗源》所选五言诗达到全书一半篇幅以上。王士禛(1634—1711)所编的《古诗笺》也给予五言诗大量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7—455页。

② 除了卷九,其他几卷均是五言诗。见徐陵编,《玉台新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篇幅。

传统批评家们对五言诗的讨论常常是对单个作品给予隐喻式的诠释,或对诗人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生活加以描绘,或对具体诗作的美学特质加以印象式点评。根据这些研究,他们概括出不同朝代诗人之间的异同。尽管他们的概括勾勒了五言诗演变的进程,但是没有揭示出其主题、形式、文体诸方面变化的脉络,也没有阐明诗歌演变背后的原动力。对一位当代批评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超越传统批评的界限,从而能够以系统化分析的方式来阐述五言诗的演变。西方学界虽然尚未见到将五言诗作为单独主题研究的专著,但是已有涉及这一课题的相关著述,如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华兹生(Burton Watson)较早的《中国抒情诗:2世纪到12世纪的古诗史》,已对不同朝代的五言诗之发展过程作过考察。^①本书则期望延续这些学者的努力,集中研究五言诗于1世纪到3世纪这一形成期间的演变。

本书的分析框架借用了西方诗学“模式”(mode)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诗学》根据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之不同来区分史诗、悲剧、喜剧等文类。^②他将“再现模式”(mode of representation)作为文类区分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无疑将“模式”这一概念视为最高批评范畴。其他西

① 虽然西方学界尚缺乏全面研究五言诗的著作,但是实际上已有不少著作讨论了创作五言诗的单个诗人。比如 Donald Holzman(侯思孟), *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A. D. 210—263)*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A. R. Davis(戴维斯), *T'ao 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 2 vol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James R. Hightower(海陶玮),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Charles Yim-tze Kwong(邝炙子), *T'ao Qian and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The Quest for Cultural Identity*,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o. 6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5); J. D. Frodsham(福洛沁), *The Murmuring Stream: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h Ling-yün (385—433)*, *Duke of K'ang-lo*, 2 vol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② James Hutton, trans., *Aristotle's Poetics* (New York: Norton, 1982), pp. 45—50。【中译参见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6页。——译者按】